

追寻

春如线

□米丽宏

这个周末，窗外响着琐碎雨声，像老祖母的低语，熟稔又陈旧。

我手里择着一把韭菜，耳边听着昆曲。心头复杂的滋味散而拢，拢而散，融在抑扬有致的曲调里。

“袅晴丝吹来闲庭院，摇漾春如线”，这曲子，这唱词，直让人觉得春天的秀雅迤迤、悠转灵动。“停半晌，整花钿。没揣菱花，偷人半面，迤迤的彩云偏。”春色闲庭中杜丽娘的苦闷，又叫人没来由的去细看这个春天：它繁盛、热闹，如众神起舞，扰扰嚷嚷，吸引人驻足流连，以至于痴迷。我们沉湎春光，做着美好又虚幻的梦。可岁月不等人，不可逆转地向前走、向前走，最后只看到一个恍惚的背影。

我不能理解，汤显祖何以将春比作“线”？

网上意外搜到吴冠中先生的一幅画作——《春如线》。他讲，这幅画是由俞振飞表演的《游园惊梦》得来的灵感。用线来绘写春天，“暗示春光之易逝，人间留不住朱颜，留不住青丝。今日丹青正艳，放歌狂舞，更遇彩点纷飞，人间欢乐只留画中看”。

画中五彩线条，无章法地占满整个画面。迷离，抽象，犹如一种玄妙的暗示。

我不满足于这个解释。春天，是如此单调的线条可以诠释的吗？春天是活的，有生命的，它们在风中一线线伸展开躯体，把这个季节一线一线染成鹅黄嫩绿？然后，再一线线成长，长高长大，直到春色老去，生命成熟？最终的结局，不过是满园春色都付与断墙残垣？

不不，春天，终究是有成长过程的，而过程会有反复，有曲折，有螺旋形起落，有着五味杂陈、惊心动魄之美。把春天解释成一线线变化的过程，是有硬伤的；抽象，牵强，有着如我这般小人物的肤浅与僵硬。

我读过很多描述春光的文章，文字里渗透着作者的才气与性灵，我深深折服并陶醉。我觉得，以春

为线的比喻，不过尔尔。

紧接着，我看到一幅摄影：碧波粼粼的水面上，柳枝柔软地挂下几缕丝绦。枝上柳芽初爆，如一串鹅黄的小蜂乍着翅膀，抬着柳枝飞；而柳枝经不住一阵风，便翩翩扬扬起来。柳下鸥鸟，顺势跃起，似与柳枝嬉戏。这幅熟悉的画面还在什么地方见过？对了，应该是央视天气预报栏目中为春天来临出示的一张“名片”。

我还看到了另一幅摄影，是一棵风中的樟树。风过处，万千柔条竟如被梳理的长发，向着一个方向齐齐飘去，说不上是赞风的壮美，还是叹树的坚韧。

一霎时，我豁然开悟。果然艺术大家都不是可以轻视的。春如线，跟春天的风有关。它让春天的树枝、小草、时光都变成了一根根抽象的线。我们和春天所有的生命，被这春风引着，一路走去，经历萌芽的痛楚、蜕变的烦恼、初长成的欣悦、成熟后的淡定，一边走一边欣赏，一边将生命的颜色变深。春风牵着我们往深处走，行到水穷处，忽一地鲜花开得正好！

如此这么一观望，又有多少光阴阴流走，多少度春风起落。

那为情可生死的杜丽娘，端的是花正含苞月未圆的豆蔻年纪，她眼里的“春如线”，当是羞涩的情窦初开，一丝情愫如烟如线，哪里经得起大风吹？晚春初夏，回头看，也一样是春色易逝，欢乐只留画中看。

莫不如，抛迟疑，揣果敢，跟着春风上路，跟着春天一起越过万水千山。春老了，人成熟了；人老了，岁月熟透了。

生命里，留下了一个实打实的春天。

酒食地狱

□孙武军

宋代朱彧的笔记《萍洲可谈》中说，北宋杭州的繁华，使得中央各部都在杭州设置机构。这些机构都有经费。知州的副职通判平日无事，就每天陪这些中央下驻单位的领导喝酒。时“东坡倅杭”，当时苏东坡任杭州通判，就要陪这些领导喝酒。而诸公又敬重东坡才华名望，每天都请他赴宴聚会，

东坡性喜酒，敢豪饮，但酒量并不好。他曾在《和渊明饮酒诗序》云：“吾饮酒至少，尝以把盏为乐，往往颓然坐睡，人见其醉，而吾中了然，盖莫能名其为醉其为醒也。”他酒量不好，一喝就醉，却还要为自己喝醉辩解，说别人说我醉了，其实我醒着呐！杭州如此可怕的喝法，让他疲于应付，实在受不了。于是就称杭州通判是“酒食地狱”。

后袁穀倅杭，适与郡将不协，诸司缘此亦相疏，袁语所亲曰：“酒食地狱，正值狱空。”后来，袁穀来任杭州通判，与知州不和，那些机构的头因此与他疏远，也没有宴请了。袁穀就对亲信说：“酒食地狱，正遇到地狱空了。”

袁穀，字容直，明州鄞县人。1056年（嘉祐元年），开封府会试，梅圣俞作考官，袁穀第一，苏轼第二。六年袁穀中进士。文献记载，1090年（元祐五年）袁穀通判杭州时，正是苏轼十六年后又回杭州任知州。袁穀来，苏轼十分开心，作《点绛唇》相迎：“闲倚胡床，庾公楼外峰千朵。与谁同坐？明月清风我。别乘一来，有唱应须和。还知么。自从添个。风月平分破。”“别乘”也称别驾，指郡守的副手，就是

通判。

袁穀以词赋名闻，又与苏轼交好。苏轼一人在杭州，吟风弄月不免孤单；袁穀来了，他便多了知音，可相互唱和，良辰美景你我各分一半。一天，袁穀与苏轼同往一山寺祈雨。苏轼说：“我们二人赋诗，以写雨来得快的胜。输的罚一顿酒饭。”于是，苏轼说：“一炉香对紫宫起，万点雨随青盖归。”袁穀则说：“白日清天沛然下，皂盖青旗犹未归。”苏轼说：“我不如你快。”于是罚了一顿酒。

所以，朱彧在《萍洲可谈》中说的袁穀与知州不和，是不是传闻错了？苏轼任杭州知州两年，袁穀来时是第二年。也可能是苏轼不久调走，袁穀与新来的知州不和，所以没酒喝了。

袁穀晚年与二兄袁穀迁居明州，住在城南长春门外。他年轻时在明州州学读书，是“庆历五先生”之一楼郁的学生。袁穀玄孙袁燮，从城南迁居府治东北半里的鉴桥，与学宫为邻，即今中山广场东北端。他因庆元党禁罢官回乡，在城南的楼氏精舍讲学。讲舍称城南书院，原是楼郁曾孙楼璘的旧宅。袁燮成为“淳熙四先生”之一。

苏轼一生，没少酒浇一肚皮不合时宜。酣醉之际，往往笔端生花。一次他饮西西湖，正逢湖上初晴后又雨，即兴写下：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此情此景正是1073年（熙宁六年）苏轼任杭州通判时。清代学者王文诰说，这首诗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当时苏公凡写西湖诗，都立意出色，技巧丰富。后来任杭州知州时，水灾严重，他劳心赈济，已没有这类杰作了。可见杭州通判无事，宴饮喝酒，虽然让苏轼谑为“酒食地狱”，但实在是让他写出了不少绝妙如天堂的好诗。